

思想接引與學術實踐：許地山、 李鏡池從燕京到香江的交遊考論

楊智文 李銘建*

摘 要：許地山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很早就得到學術界及社會公眾的關注，但他在學術方面的成就則相對冷門。作為許地山的學生，李鏡池在許地山的引領下走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其思想和人格也深受許的影響。抗戰期間，兩人同處香港，李鏡池協助許地山完成了《道藏子目通檢》的編纂，為許地山對道教的全面研究完成了全面的資料庫工作。由於許地山在港突然去世，其宏大的學術計劃戛然而止，已有成果也在戰火中下落不明。通過梳理比對許地山、李鏡池在港學術合作的細節資料，和不同親歷者的回憶資料，不僅有助了解兩人相關學術研究在香港學術史上的重要意義，也為尋找許地山遺作的下落提供了

* 楊智文，歷史學博士，仲愷農業工程學院講師；李銘建，李鏡池嫡孫，人類學博士，廣州新華學院中文系副主任。

本文係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四五」規劃 2025 年度常規課題（共建）「李鏡池散見著述的整理與研究」（課題編號：2025GZGJ386）之階段性成果。

思路和線索。

關鍵詞：許地山 李鏡池 宗教研究 教育改革 道藏子目
通檢

引言

許地山（1894—1941），筆名「落華生」，著名愛國學者，中國「五四」新文學先驅之一，不僅在現代文學史上享有崇高聲望，在宗教學、民俗學、人類學等方面也有卓越貢獻。李鏡池（1902—1975），廣東開平人。1927—1931 在燕京大學進修並工作，師從許地山、顧頡剛、陳垣等。後以《周易》研究聞名，其《周易探源》《周易通義》等是二十世紀具有國際影響的著作。許地山與李鏡池的師生情誼，始於1927 年李鏡池入讀燕京大學之時，持續到1941 年許地山在香港突然離世。在許地山生命的最後階段，即其學術研究的關鍵時期，他與李鏡池的學術合作十分密切。許地山逝世後，李鏡池撰寫了一系列回憶許地山的文字，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仍處於未公開發表的手稿狀態（特別是李鏡池晚年撰寫的回憶錄和日記，原件目前仍收藏在李鏡池家族後人的手中）。這些文字為我們提供了衆多細節，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兩位學者的交誼和學術活動。

作為現代文學史上被人們「逐漸認識」的作家^①，許地山在文學方面的成就與貢獻早已為學界及公衆所熟知。至於許地山在文學領域以

① 王盛：《許地山研究五十年（待續）》，《台港與海外華文文學評論和研究》1995 年第3 期；
王盛：《許地山研究五十年（續完）》，《台港與海外華文文學評論和研究》1995 年3、4 期。

外的學術成就，則到進入 21 世紀之後才逐漸被學界所了解。薛克翹指出，許地山的著作「可以分為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兩大部分，領域寬泛，體裁多樣」。^① 曹小娟也提及：「許地山是『五四』時期少有的通才學者，他對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民俗學、心理學、語言學、文學、考古學、甚至生物學都有深刻的研究。」^② 目前學者們在探討許地山的學術成就時，主要依靠的是許地山生前已經公開發表的成果，但由於許地山英年早逝，他的很多學術計劃尚未展開，僅靠其生前已經發表的成果實不足以對其學術體系及成就作全面的評價。作為許地山早年的學生和晚期的學術助手，李鏡池與許的互動持續很久且頻繁。許的學術思想、社會關照、乃至人格等，都對李鏡池有深刻影響。特別是在許去世前的 1939—1941 年間，許、李兩人同處香港，通力合作，完成了一系列繁難但重要的研究。李鏡池的記述較全面地反映了這些學術活動和著述的概貌，為進一步探討許地山乃至當時香港學術界現代化轉型的活動和學術成就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線索。

因此本文將結合李鏡池的記述，展示許地山對李鏡池學術之路的影響。從李鏡池的視角出發，探討許、李二人的學術合作，以期從一個前人未曾涉足的層面展示關於許地山宗教學研究的更多細節。

一、許地山宗教研究對李鏡池學術入門的影響

李鏡池作為二十世紀著名的易學專家，學術界一般將其譽為「古

① 薛克翹：《許地山的學術成就與印度文化的聯繫》，《文史哲》2003 年第 4 期。

② 曹小娟：《許地山的學術思想與方法研究》，《西安工業大學學報》2014 年第 5 期。

史辨派諸位治《易》的學者中，唯一一位有完整經註作品的學者」。^① 在探討李鏡池青年時期進入易學研究的方法和路徑時，主要以顧頤剛主編的《古史辨》第三冊上編的《周易》研究專輯（1931 年出版）為依據，認為李鏡池的早年易學研究主要受顧頤剛「古史辨」思潮的影響。

但是，如果結合李鏡池的記述，許地山的宗教學研究和在燕京大學時期的教學，對李鏡池的易學研究更早發揮了引導的作用。據李鏡池回憶，1927 年，許地山回到母校燕京大學任教。恰在同年，剛從廣州協和神學院畢業的李鏡池得知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舉辦宗教學短訓班，決定北往燕大進修。臨行前，李鏡池就讀培英中學時期（1918—1922）的學長、燕京大學畢業生葉啟芳（1898—1975）建議李鏡池到燕大可找許地山先生。^② 果然，李鏡池到燕大的第一天，就在註冊處見到了許地山。在廣州生活多年的許地山用地道的廣州話與李鏡池交談，並指導他辦理註冊手續。^③ 李鏡池與許地山的交誼就在這鄉音的攀談中開始了。

李鏡池本計劃只在燕京大學學習一年，幸運的是，後來因先後得到師友們的幫助（如陳垣邀請李鏡池去擔任國學研究所的助理員），他留在燕京大學的時間得以延續至四年。^④ 四年的時間讓李鏡池有了充分的時間去聆聽衆多知名學者的授課，除了朱自清的「新文學研究」、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郭紹虞的「中國文學史」、鄧之誠的「中國通史」外，李鏡池尤其留意史學、宗教學方面的課程。如陳垣的「中國

① 林慶彰主編，李慈恩著：《李鏡池易學研究》，新北：台灣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 年，第 40 頁。

② 李鏡池：《青少年時期「苦」學的生活》（手稿），1967 年，李鏡池家族私藏。

③ 李鏡池：《青少年時期「苦」學的生活》（手稿），1967 年，李鏡池家族私藏。

④ 李鏡池：《青少年時期「苦」學的生活》（手稿），1967 年，李鏡池家族私藏。

基督教史」、「史學要籍」，顧頡剛的「上古史」，以及許地山開設的「中國禮俗」、「佛教文學」、「道教史」等。^①需要注意的是，對宗教學的興趣是推動李鏡池前來燕大求學的主要原因。早在1926年，還在協和神學院讀書的李鏡池就公開發表了《怎樣研究宗教》一文，綜合了當時衆多學者有關宗教的論述，認為各家對宗教之觀點衆說紛紜，即便是「宗教之定義」，已經是「言人人殊」，「各家學者所論，又各有其所研究的學問之色彩。哲學家說宗教帶有哲學的意味，社會學家說宗教便當富有社會性，其餘心理學家、倫理學家、生物學家……，無不將他們的顏料，塗在宗教的圖畫之上」，導致了「宗教問題便變成了難以解決的東西了」。^②基於這樣的認識，李鏡池有意選擇以宗教研究為主攻方向，並在前往燕大學習之前就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宗教學知識。到了燕大讀書後，李鏡池關於宗教學方面的知識也獲得了燕大師友們的肯定。陳垣在講授中國基督教史時，提及有幾個清宗室信天主教，卻不知其名。李鏡池翻查資料，確認此人為親王德沛。陳垣《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中云：「……然徒知其聖名若瑟，而不知其本名為誰，嘗屬門人李鏡池考之，李君謂非德沛莫屬。」^③可見李鏡池在宗教學方面的知識得到了陳垣的認可。

李鏡池選擇以宗教學為切口展開自己的學術研究，而許地山正是研究宗教的大家。回顧許地山的求學經歷，他曾先後在燕京大學、哥

① 李鏡池：《回憶錄》（手稿），1967年，李鏡池家族私藏；李鏡池：《灰塵集》（手稿），1968年，李鏡池家族私藏；《青少年時期「苦」學的生活·燕大三年》（手稿），1967年，李鏡池家族私藏。

② 李鏡池：《怎樣研究宗教（未完）》，《真光》1926年第3期；李鏡池：《怎樣研究宗教（二）》，《真光》1926年第7—8期合刊。

③ 陳垣：《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輔仁學志》1932年第2期。

倫比亞大學及牛津大學攻讀與宗教相關的課程。在燕大任教後，許地山開設了多門課程，其中有不少都是與宗教相關的，如「佛教哲學」、「佛教文學」、「中國佛教史」、「中國宗教史」、「道教史」等。^①在諸多宗教流派中，他對道教給予了特別的關注，並曾撰文分析道教對中國人思想的影響稱：「儒道兩家底思想可以說是整個中國思想底兩方面。儒家注重實際底生活，而道家則重玄想，……從我國人日常生活底習慣和宗教底信仰來看，道底成分比儒底多。我們簡直可以說支配中國一般人底理想與生活底乃是道教底思想。」^②他留學英國期間，倫敦大學舉辦「帝國宗教大會」，許地山將其原先用中文寫成的有關道教研究的論文翻譯成英文，委託給他的老師在大會上宣讀。^③至燕大任教後，許地山在道教研究方面依然有着完整的計劃，李鏡池後來對此回憶道：「許師……歸國後，除在燕大、北大、清華、港大等大學講授宗教比教學外，頗有完成其道教史之宏願，而尤着力於工具書之編著，為後來學者開方便之門。」^④

在研究道教的過程中，許地山意識到，「道教底淵源非常複雜，可以說是混合漢族各種原始的思想所成底宗教。……道教除了後來參合了些佛教思想與儀式之外，幾乎全是出於道家底理論。道家思想底淵源也與儒家一樣同出於《易》」。^⑤基於這樣的認識，許地山自然對《周易》及與其相關的文本給予關注：

① 李鏡池：《許地山先生傳略》，《民俗》1943 年第 3、4 期合刊。

② 許地山：《道家思想與道教》，《燕京學報》1927 年第 2 期。

③ 夏寅：《許地山編年事輯（北京時期）》，陳思和、王德威主編：《史料與闡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 年，第 334-426 頁。

④ 李鏡池：《關於許氏道教研究的信》，《民俗》1943 年第 3、4 期合刊。

⑤ 許地山：《道家思想與道教》，《燕京學報》1927 年第 2 期。

從傳說方面，我們知道在現存的《周易》以外，還有《連山》與《歸藏》兩種。三《易》不同之點，在乎對卦底安排次序。……《周易》底《繫辭傳》雖然說是孔子作底，但其中引申《歸藏》底思想比較《周易》似乎多一點。《繫辭傳》當成於先秦時代，與《呂氏春秋》、《道德經》、《禮運》等先後出現於世。如將這幾本書用比較的方法去研究一下，定然很有興味。^①

顯然許地山意識到有對易學典籍進行文獻學考察的必要。於是在道教史課堂上，他把《周易》列為課程作業的專書研究選題之一，而學生李鏡池就選了這個選題。李鏡池晚年在回憶錄中，提及自己為何會走上《周易》研究的道路時，曾詳細地介紹了許地山和顧頡剛對他的影響：「在許地山先生的功課內把《周易》作為專題研究的對象。許先生住城內，上課才來，請教的時候少。顧先生住成府，在燕大東門外，故我常到他家裏去，借書和請他指導。」^②也就是說，許地山道教史課的引領與啟發，是首先觸動李鏡池走上《周易》研究之路的第一契機。而後，在與顧頡剛更多的互動討論中，寫出了數篇易學文章，載於《古史辨》，一戰成名。李慈恩的《李鏡池易學研究》和斯滿紅《古史辨派易學研究》是目前對李鏡池和古史辨《周易》研究情況探討較為全面系統的著作。但它們在探討李鏡池的《周易》研究路徑時受限於材料，都只考察了顧頡剛「古史辨」思想與郭沫若唯物史觀等對李鏡池的影響，沒有注意到許地山宗教學研究尤其是道教研究對李鏡池

① 許地山：《道家思想與道教》，《燕京學報》1927年第2期。

② 李鏡池：《青少年時期「苦」學的生活》（手稿），1967年，李鏡池家族私藏。

的引導作用。^①

關於許氏宗教學研究的深厚功力，陳寅恪在《論許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學》一文中曾有一段著名的話：「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學，然於道教僅取以供史事之補證，於佛教亦止比較原文與諸譯本字句之異同，至其微言大義之所在，則未能言之也。後讀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論文，關於教義本體俱有精深之評述，心服之餘，彌用自愧，遂捐棄故技，不敢復談此事矣。」^② 結合陳寅恪的這段話，可見學術界確有更深入地探討許地山宗教研究思想的必要。李鏡池的周易研究受許地山道教研究的啟發，他自己也曾承認：「我跟許先生讀過好幾年書，我讀書的興味與方法，可說是許先生教給我的。他底思想與人格，更影響了我不少。」^③ 許地山本人並未對《周易》進行全面研究，但他說的要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周易》的文本，最終由他的弟子李鏡池付諸實踐，並對李鏡池的學術之路產生了終生的影響。

二、對教育改革의 共同關注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經歷了早期的新文化運動與「整理國故」的洗禮，北大國學門、古史辨派和史語所先後成立，唯物史觀蓬勃興

-
- ① 林慶彰主編，李慈恩著：《李鏡池易學研究》，新北：台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246頁；斯滿紅：《古史辨派易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第1-276頁。
- ② 陳寅恪：《論許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學》，周俟松、杜汝滸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67頁。
- ③ 李鏡池：《吾師許地山先生》，盧瑋鑾：《許地山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第47-64頁。

起，教育界也走進了改革的「深水區」。^① 許地山、李鏡池師徒均被不同程度地捲入這場教育改革之中。

1931年7月，李鏡池結束了四年的燕京大學進修和工作，返回廣州，入職母校廣州協和神學院。據李鏡池晚年回憶，到任伊始，他就成竹在胸，大刀闊斧地按燕京大學等北方院校的課程設計，結合協和神學院的實際，進行了課程改革：

我把課程改革了，除第一年仍用「國文選讀」外，二年講「中國文學史」，三年「中國學術思想」，四年「中國宗教史」。「選讀」也不是過去那種逐句解釋，而着重於中國語文的形義、音韻、語法、修辭等，使學生有語文的全面概念，培養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由廣而狹互相聯繫，「語文」——「文學史」——「學術思想」——「宗教」，因為這是宗教學院，故講中國宗教史。當然這些課程不能全面鋪開，時間精力有限，先講兩門，然後三門。學生只能合班輪流學習。此外還有聖經科，附近還有間崇基女校，性質和聖經科相近。雖不能由我一手包辦講中國功課，也得兼顧給他們講點淺近的，這就把我忙得不可開交。但為了同學，不能不改革。過去自己不滿的難道可以再犯嗎？^②

李鏡池不憚繁難，以一己之力推動教學改革，顯然是受到在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期間所見識的教育理念和課程設計的影響。讓李鏡池驚

① 盧毅：《「整理國故」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② 李鏡池：《青少年時期「苦」學的生活》（手稿），1967年，李鏡池家族私藏。

喜的是，1933 年 6 月，許地山南來廣州中山大學講學。師徒二人分別不到兩年便又重逢。此次南來，許地山的最終目的地是印度，但為了籌措前往的經費，於是應邀至位於廣州的中山大學任教半年。^①來到廣州後的許地山如魚得水，因他小時在廣州長大，這裏的氣候和風土人情令他有故鄉的感覺。許地山在廣州講學期間，李鏡池與葉啟芳等一道陪同他參觀考察少時就熟悉的各處名勝古跡，此外，李鏡池還邀請許地山到協和神學院講學。李回憶說，許地山「很喜歡的答應了。一連幾天，他老遠的跑來，連舟車費也不要」。著名民族學家羅致平（1911—2005）當時在廣州協和神學院就讀，曾親聆許地山的授課：「那時候許先生是在中大教書，在協和作特別講演的，他講的是『中國禮俗與宗教』。第一次講演給我的印象是態度安閒，談吐生風，極善處置教材的好學者。他可算是我認識的教授中態度最雍容的一位了。他跟陳序經（主講文化問題）謝扶雅（主講哲學）盧觀偉（主講倫理學）諸先生都有些異樣。」^②許地山講課時，李鏡池在旁邊把許地山提及的不容易為學生理解的專門名詞寫到黑板上，免得許有「來回講寫的辛苦」，所以許地山「講得很安閒而清晰」。^③在離開廣州之前，許地山還把他最新編成的《佛藏子目引得》送給了李鏡池。日後二人在香港合作《道藏子目通檢》，似乎在此處已埋下伏筆。

許地山南來廣州講學之時，恰逢讀經運動在廣東盛行。讀經運動

① 夏寅：《許地山編年事輯（北京時期）》，陳思和、王德威主編：《史料與闡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 年，第 334-426 頁。

② 羅致平：《紀念民間宗教史家許地山先生》，白翠琴主編：《羅致平文選》，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 年，第 43-46 頁。

③ 李鏡池：《吾師許地山先生》，盧瑋鑾：《許地山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 年，第 47-64 頁。

始於 1932 年古直擔任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之時，至次年經主政廣東的陳濟棠的倡議，遂在廣東掀起了更大的波瀾。^① 許地山在中大講學期間，親身感受到當時的讀經風氣，但他對這種機械的復古不以為然，尤其批評把吟詩作賦作為現代大學畢業論文的做法。^② 1935 年初，胡適南遊廣東，也表示反對讀經，引發了規模空前的讀經風波。當時已返回北平的許地山公開發言，聲援胡適：「關於『讀經』，我並不反對，不過我所贊成的讀經，是要讀的有點意義。站在保存我國故有文化的立足點去讀經，並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去讀唸，毫無意義的去死唸，那未免有些太無聊了。在《左傳》、《孟子》、各經書上有好多有意味的故事，若是摘下來給中小學的學生去讀，是很好的教材，但是拿整部的經書來只就字面去讀，卻有些不妥當。」^③

有意思的是，就在許地山聲援胡適之時，銳意教學改革的李鏡池也在 1935 年發表文章表達了與許地山類似的觀點——他不僅反對八股式「讀經」，更呼籲在國難當頭之際，要認識「讀史」的重要性。他說：

近來頗有人提倡讀經。依我想，倒不如提倡讀史好。因為讀經讀到頂點，不過是明白了古時做人的大道理。雖說於正心、誠意方面頗有功效，但於民族意識方面，究無多大裨益。讀史的效果，就不同了。數千年來民族光榮的時期，固可以使我們自覺民族的偉大，刺激起愛我華胄的情緒；就是在幾個衰落的朝代，如晉如宋，其士大夫之

① 張凱、唐雨婷：《1935 年胡適南遊與北學南傳》，《安徽史學》2024 年第 6 期。

② 《許地山談：讀經意見》，《益世報》（天津）1935 年 2 月 7 日，第 8 版。

③ 《許地山談：讀經意見》，《益世報》（天津）1935 年 2 月 7 日，第 8 版。

氣節，亦可以供給目前的參考，而使我們奮發起來。所以處於現在的情況下，讀史比較讀經有益。況且讀經而無史學的眼光，則經有時讀不通。^①

這種讀史明志的清醒，與許地山在1934年旅印家書中談及的「歷史有助於我們清理思想，借鑒歷史經驗檢查過去，指導現實」，「正可以幫助我們對中國深受帝國主義侵略，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痛苦經驗，也對祖國某些方面落後的原因有所了解」，在思想上完全契合。^②

三、抗戰風雲中民族國家意識的共鳴

1934年夏，許地山的印度考察結束，返回燕大。席不暇暖，許地山便擬定了「寫作《中國禮俗史》的計劃」，^③但時局的動盪讓他再難以安坐書齋——一方面，「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勢力迅速向華北滲透，咄咄逼人。另一方面，經歷了1932年的淞滬抗戰和1933年的熱河事變，人們的反日情緒也空前高漲。1933年夏，許地山曾攜自己編印的台灣抗日誌士、先父許南英的詩集《窺園留草》往台灣探親。目睹已淪陷三十年的台灣，他痛心疾首。此刻他看到了岌岌可危的華北局勢，更加坐不住了。

1935年4月6日，許地山在北平的文天祥祠為學生作愛國演講，

① 李鏡池：《〈十通〉的特點》，《同行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第19-20頁。

② 許地山：《爐邊獨語 許地山散文精選》，濟南：泰山出版社，2023年，第121-122頁。

③ 夏寅：《許地山編年事輯（北京時期）》，陳思和、王德威主編：《史料與闡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334-426頁。

並當場誦唱文天祥的《正氣歌》以激勵學生。^①同一時期，李鏡池也在《廣州青年》雜誌發表了一篇《正氣歌的譯文》，探討如何將此詩更好地譯成明白曉暢的現代文，讓讀者易於理解，並表示「在現在國難期中，叫學生多讀點這類的文學是很好的。」^②由此可見師生之間默契。

許地山「激進」的抗日思想和行動，讓他在北平這座風雨欲來的危城待不下去了。1935年8月，因胡適的推薦，許地山離開北平，前往香港大學任教。然而就在許地山南下的當月，李鏡池卻拖家帶口到了北平，這似乎有些蹊蹺。原來在當年3月，司徒雷登南下廣東「考察華南文化教育事業」時，^③與在協和神學院任教的李鏡池見過一面。見面時，要「拉」李回燕京大學任教。至於「拉」他的原因，李鏡池後來回憶，也許是司徒預感到不馴服的許地山終將離任，而李鏡池相對來說更「馴服」些^④。李鏡池當時沒有想像到北平情況之惡劣，以為有機會回到燕大，可以重拾五年前那段學業精進、成名成家的快樂時光。今存燕京大學1936年的一份李鏡池研究計劃書，可以看到李鏡池此次返回燕大，帶着一個宏大的宗教學研究十年計劃：「先研究古代中華原有之宗教思想，次研究中世外來宗教對於中國之影響，次研究近世之教亂及各種祕密結社。」^⑤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馴服」的李鏡池一來北平，就陷入與許地山同樣的「國破」之痛中，對當地的日寇氣焰之盛極為不適。勉強工作了一年，至1936年夏，因「華北危殆，不

① 夏寅：《許地山編年事輯（北京時期）》，陳思和、王德威主編：《史料與闡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334-426頁。

② 李鏡池：《正氣歌的譯文》，《廣州青年》1935年第22期。

③ 《教育簡訊》，《民國日報》（廣州）1935年3月25日，第10版。

④ 李鏡池：《批判》（手稿），1968年，李鏡池家族私藏。

⑤ 《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教員研究專題概覽（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350頁。

可久留」^①，李鏡池也辭去燕大教職，舉家返回廣州，繼續任教於廣州協和神學院。

返回廣州後的李鏡池與此時已在香港的許地山走得更近了。1936 年協和神學院的畢業禮拜，李鏡池邀請許地山從香港前來演講，並將許地山的講稿整理成文字，加上「人生問題底解答與我們底信仰」為題，次年刊登於《協和》學報，希望為戰爭陰霾中惶惶然的學子們指明人生方向^②。在同一期《協和》上，李鏡池也刊發了自己的三篇「宗教短論」：《正義與主動》《和平運動》和《狂妄的「德國神通教」》，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與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險惡，以明心志。「七七事變」爆發後，在港的許地山更加積極地參與抗日救亡社會活動，並受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委託，為留港文化人籌辦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③李鏡池也在《廣州青年》雜誌發文，呼籲教會在修養、研究、訓練、組織等方面教育民衆^④，並親自參加協和神學院救護隊，救護日機轟炸下的廣州市民。1938 年廣州淪陷後，已返回開平老家的李鏡池，在當地組織抗日義演募捐，並與村中十幾名青年組成游擊隊，以備日寇來犯時保衛家鄉^⑤。

家國觀念上的一致讓許地山、李鏡池的師徒情誼在戰火的陰霾下得到昇華，這也為兩人日後在香港進行深度的學術合作奠定了更堅實的情感基礎。

① 李鏡池：《灰塵集》（手稿），1968 年，李鏡池家族私藏。

② 許地山：《人生問題底解答與我們底信仰》，《協和》1937 年第 21 期。

③ 許瑞生：《嶺南的記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252 頁。

④ 李鏡池：《國難中教會應有之工作》，《廣州青年》1937 年第 44 期。

⑤ 李鏡池：《抗日戰爭時期雜憶》（手稿），1968 年，李鏡池家族私藏。

四、在香港的交往與學術合作及許地山遺作下落之線索

七七事變後，內地絕大多數大學或學術機構被迫向內陸偏遠地區遷徙，學者們從此顛沛流離，生計不保，性命堪虞，學問研究大受影響，而許地山早於 1935 年即南來香港大學任中文學院院長，所以尚能安定。許地山來港數年間，對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進行了大量的改革，按文、史、哲分系科，革新了課程體系，排除了一批被李鏡池稱為「國學頑愚派」的老學究，並敦聘陳寅恪、馬鑒等具有新學科視野的知名學者出任港大教授。許更積極參與抗日相關的社會文化活動，保護和接濟來港的進步文化人士。機緣巧合，李鏡池正是在此時落難香港，不僅得到許地山的援助，而且得以與許地山進行了近兩年的密切合作，完成了以《道藏子目通檢》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李鏡池是於 1939 年初第一次來港。當時廣州協和神學院擬遷往雲南大理復學，通知李鏡池先到香港等候。李鏡池遂偕同長子念國一起從開平老家赴港，在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落腳，並接替許地山先生在道風山講《中國哲學史》課^①。在港停留一個月後，協和校長龔約翰與李鏡池等繞道越南前往大理喜洲籌備復課。但到了大理，協和學校規模已嚴重縮小，老師缺，學生更缺，辦學經費捉襟見肘。暑期時，校方對李鏡池稱，崇基女校將在港復課，讓李回港到崇基任教。結果李鏡池回港後才知崇基女校並無復課計劃，協和神學院等於是變相把李鏡池辭退了。猝不及防之下，滯港的李鏡池一家陷入了生活窘境。

情急之下，李鏡池向百忙之中的許地山求助。許聽了李鏡池的遭

① 羅致平：《紀念民間宗教史家許地山先生·前言》，《民俗》季刊 1943 年第 3、4 期合刊。

遇後，安慰他道：「你來得很好，我還要像你這樣的人，幫我做道藏的詳細目錄索引。我寫了一卷《道教史》，沒法寫下去。要看幾千卷的道藏是看不了的。要做個詳細子目索引，按目找材。我找了一個大學畢業生給我做，她幹不了。你可幫我做。」^①此時的許地山正在籌劃撰寫《道教史》的下卷。1934年出版的《道教史》上卷主要探討道家思想，下卷則關注道教本身。李鏡池也知道，要探討道教離不開對《道藏》文獻的利用，但《道藏》文獻異常蕪雜。「有不少是扶箕之作，有改頭換面襲用佛書的，有和道教無關的。書很多而可用的卻少。披沙淘金，十分艱苦」。子目的編寫絕非易事，「因道教書內容雜亂無味，看了令人頭痛」。許地山在香港，既要負責教育改革的工作，也要忙於各種社會活動，無法埋頭研究，所以「想找個竅門，從《道藏》詳細子目中來檢查材料」^②。

近現代學術研究極重文獻資料的完備。在許地山的計劃中，《道藏子目通檢》的整理編纂是為了建立一個道教文獻資料庫，以備《道教史》撰寫之需求。許地山曾請燕大社會學一位畢業生幫他做這工作，沒能做成，只抄寫了一份書目^③。李鏡池返港，自然就成了此事的不二人選。從雲南返港的第一年，李鏡池每天都要花半天的時間來許地山書房協助編寫子目，而許地山則從自己的收入中每月拿出40元補貼李鏡池，也幫李的一家度過了失業的難關。1940年，李鏡池在香港培英中學重新覓得教職，但課餘依然到許地山處編子目。

《道藏子目通檢》的編寫持續了將近兩年。許、李在這個階段合作

① 李鏡池：《1969年10月15日日記》（手稿），1969年，李鏡池家族私藏。

② 李鏡池：《抗日戰爭時期雜憶》（手稿），1968年，李鏡池家族私藏。

③ 李鏡池：《抗日戰爭時期雜憶》（手稿），1968年，李鏡池家族私藏。

緊密，李鏡池回憶稱：「除了星期日，我跟他幾乎天天見面。我有所發見，必定告訴他；有所疑，去問他；他有所得，也常常跟我談論。」^①他還回憶起「編錄此稿時，與許師各居一室，相距咫尺，時相談晤。商訂條例，考證作者，檢查訛謬。奇寒酷暑，未嘗間斷。工作之餘，煮茗談天。聞喇叭聲，則許師母駕車來迎；友朋過從，如葉啟芳先生、楊剛女士、陳樂素先生（援庵師之子）等；馬季明師在樓下，則更常見。此中歲月，憶念常快」。^②在戰雲密佈的香港，還有兩位學人在百忙中抓緊時間潛心學術資料整理，這真是一幅令人難忘的景象。

到 1941 年上半年結束時，《道藏子目通檢》的編纂基本完成，共編成兩三萬張卡片。按照許地山的計劃，卡片交香港商務印書館安排抄寫兩份：一份用於排印出版，作為香港大學中文書院叢書之一；另一份則由許地山自己留着，用於編著《道教史》時檢查之用。^③

許地山打算寫一篇題為《道藏源流考》的文章，作為《道藏子目通檢》的序言。根據李鏡池的記述，許地山在 1941 年暑假前已經準備了足夠的資料，但由於應酬太多，不能安心寫作，於是決心暑假避到沙田去安靜寫作。與此同時，李鏡池也在全力以赴地「把道藏中著作年代或著作人不明底書，設法儘可能的把它考證出來」，以供許地山日後著《道教史》下冊時參考使用^④。李鏡池正在考證《天上祕要》一書時，許地山從沙田返回市區一趟，將《天上祕要》一書的前數冊拿

① 李鏡池：《吾師許地山先生》，盧瑋鑾：《許地山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 年，第 47-64 頁。

② 李鏡池：《關於許氏道教研究的信》，《民俗》1943 年第 3、4 期合刊，第 84-85 頁。

③ 李鏡池：《許地山先生與道教研究》，周俟松、杜汝渺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第 381-386 頁。

④ 李鏡池：《許地山先生與道教研究》，周俟松、杜汝渺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第 381-386 頁。

走。於是李鏡池就對剩下的數冊《天上祕要》仔細研究，將其中所引道書編了個目錄，以便與他書作參校之用。過了幾天，許地山又從沙田返回，帶來了一疊書稿，正是他新作的「天上祕要所引道書目錄」。李鏡池感到十分驚喜，他沒想到自己的工作竟與許地山的不謀而合^①。許地山這次離開前，可能覺得來回奔波，自己身體有些吃不消了，便與李鏡池約定：「恐一時須參考重要材料，可電告你將材料送去。」^②許離開後，李鏡池將許與自己所作目錄進行比較，發現許的目錄比自己所作的「詳細而且整齊」，於是就參照許的稿子將自己所作的目錄補充完整。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此次與許地山的離別，竟成永訣！大約一個星期之後，李鏡池接到了友人的一通電話，聽到的是許地山逝世的噩耗。

許地山的突然離世令所有人感到意外。李鏡池除了悲痛之外，作為學術助手，更感到許氏遺著保存和整理的迫切性。他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撰寫了《吾師許地山先生》《許地山先生底著作》《許地山先生與道教研究》等數篇文章。他一方面悲悼許先生的離去，「我現在對着他的遺稿，想念他勤勞的工作，寫出來的，那有他所知道的百十分之一呢！這艱巨的事業，這垂成的著作，竟這樣消逝了！中國學術界怎麼這樣不幸呢！」^③另一方面，他儘量回憶、梳理許地山的學術計劃和遺稿情況。在《許地山先生與道教研究》一文中，他所記的許地山遺著包括：

-
- ① 李鏡池：《許地山先生與道教研究》，周俟松、杜汝渺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81-386頁。
- ② 李鏡池：《關於許氏道教研究的信》，《民俗》1943年第3、4期合刊。
- ③ 李鏡池：《許地山先生與道教研究》，周俟松、杜汝渺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81-386頁。

《道教史稿》。其內容大概分為七個部分，分別是「漢武帝以後底巫祠與神仙底追求」、「後漢之神仙家」、「黃帝與漢代底黃老道家」、「道教之成立與墨子老子和易經底關係」、「于吉」、「張陵」、「丹鼎哲學」。李鏡池提及，「全稿共約七萬言。字跡頗清晰，校對一過，即可發表，為前史之續或合成一書，為《道教底發生與成立》」。^①

《雲笈七籤校異》。據李鏡池所言，許地山「研究道藏，以七籤一書為主，詳細校讀，將道藏本與清真館本比較異文，又將《七》後所引諸書而可查底一一勘對，文有可疑，苦於無參證底，亦標誌所疑」，由此形成「稿本二冊，從序文校起，至卷二十二」。^②李鏡池認為，「此稿對於研究道教者極有貢獻，頗想就其稿細心校訂增補，完成其未竟之功，名曰『雲笈七籤考異』」。^③

《道教辭典》。據李鏡池介紹，「許先生研究雲笈七籤，將其中名詞術語，摘錄出來，或只標卷頁，以便尋檢，成卡片約萬紙。這部分材料，預備編著《道教史》之用。史成，再將此片整理成辭典」。^④也就是說，「道教辭典」是寫在卡片上的。

《道教編年表》。由於「道教徒個個要做神仙，超生死，忘日月」，「不特不計算時間，甚至要混亂時間，假造年月」，於是許地山「一面讀書，一面札記，把道教大事及人物記在紀元通譜本子上」。李鏡池認為，雖然許地山沒有將這個編年表寫成專書的意圖，「不過照這方法來

① 李鏡池：《許地山先生與道教研究》，周俟松、杜汝渺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81-386頁。

② 李鏡池：《許地山先生與道教研究》，周俟松、杜汝渺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81-386頁。

③ 李鏡池：《關於許氏道教研究的信》，《民俗》1943年第3、4期合刊。

④ 李鏡池：《許地山先生與道教研究》，周俟松、杜汝渺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81-386頁。

做，編成一本《道教編年》，也是很有價值的」。^①

許地山身後留下的道教研究遺著可謂宏富，也大都基本成型。除去以上李鏡池所提及的之外，還有當時已經交稿的《道藏子目通檢》卡片。李鏡池對於《道藏子目通檢》的出版是抱有信心的，所以在《許地山先生與道教研究》文中將《道藏子目通檢》列入「已發表或已付印底著作」，而許的其他遺著，他也有志於為許師整理，完成其未竟之功。

然而，局勢急轉直下。許地山去世後不到四個月，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1942年10月，許地山夫人周俟松攜子女離開香港。臨行前，她將許地山的一些遺物和書籍寄存於香港大學，自己只攜帶了幾個「載書的箱籠」。不幸的是，這些箱籠在碼頭因潮水上漲被泡在海水中，雖經努力打撈，但依然破損嚴重。^②許地山生前已經被送到商務印書館的《道藏子目通檢》卡片，許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在離港後得到的消息是：「日寇佔領香港後，據說把印書館藏稿室改為馬廐，地山三萬張稿卡散失無遺。」^③

另一邊，早在1942年初，李鏡池一家已被迫乘坐難民船離開香港返回開平老家。臨行前「不敢挾稿以行。我自己之稿，亦棄置友人處；許師遺稿則交馬鑒先生代存，馬先生回國，亦未知何處」。^④李鏡池提及的馬鑒，出生於1883年，曾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5年至1936

① 李鏡池：《許地山先生與道教研究》，周俟松、杜汝渺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81-386頁。

② 余思牧：《作家許地山》，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第277頁。

③ 許鋼：《許地山年表》，許鋼：《許地山香港作品選》，香港：香港文學館，2024年，第341頁。

④ 李鏡池：《關於許氏道教研究的信》，《民俗》1943年第3、4期合刊。

年間任燕京大學國文系教授，1936年3月因許地山與陳君葆的舉薦而被香港大學聘用。1943年，李鏡池應羅致平之請，撰寫《關於許氏道教研究的信》時，憂心忡忡地提起《道藏子目通檢》一書道：「既痛許師不能利用此工具以完成大著道教史，復恐此稿毀於炮火，永沒於人間，則他日之研究道教者又須另起爐灶，重新工作。」^①

許地山的友人、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在香港淪陷後一直留在香港。據陳記錄，1942年1月9日，陳君葆被日軍扣留詢問圖書館事宜；1月13日，日方人員又進入馮平山圖書館全面搜查，特別查看了許地山的遺書；2月4日搜出衛立煌寄存許地山處的物件時，還逼令陳君葆說明情況。到抗戰結束後，陳君葆參與審問日方負責人時，卻發現他們對馮平山圖書館資料的丟失有意抵賴，含糊其辭。^②以日本人對許地山的關注，他們直接毀掉許地山遺稿的可能性並不高，但是否已盜運他處，迄今不得而知。

李鏡池在1942至1945年間與家人流離於開平、台山和韶關、連山等地，直到1945年秋才從梅縣隨嶺南大學回到廣州。其後他曾往香港英華中學為人代課兩周，並抱着一線希望，「順便看看我寄存在香港的書物，還保存多少。誰知我住過的樓有白蟻（不是我住的地方，但書物卻寄存在樓上，剛好遭劫），所有的書全被白蟻蛀光，只剩一部《辭海》，沒蛀進去（當因是瑞典紙印的，有藥味）。」^③李鏡池自己在港藏書盪然無存，但馬鑒先生代存的許地山遺稿如何，則未見李鏡池

① 李鏡池：《關於許氏道教研究的信》，《民俗》1943年第3、4期合刊。

②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二：1941—49》，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第54、427頁。

③ 李鏡池：《抗日戰爭時期雜憶》（手稿），1968年，李鏡池家族私藏。

提及。現存資料亦見陳君葆曾致信李鏡池，告訴他可能「《道藏子目通檢》尚存」。李鏡池回信表示對此「頗有懷疑」。他說，《道藏子目通檢》卡片較薄，約有四葉，而許地山另有《道藏辭典》卡片，紙厚，存卡箱內。他想陳君葆確認一下所見為何種。^①李鏡池的這封回函落款時間僅有「三月九日」，未寫年份，但信中提及了自己在香港的藏書遭遇蟲蛀之事，可見此信當在李鏡池從香港代課回來之後寫的。其後陳君葆有無來函，李鏡池有無再去香港，目前未見記載。

1932 年，顧頡剛曾在日記中將許地山、陳垣、江紹原、李鏡池等列為宗教史研究專才^②。1946 年，顧頡剛與記者談論中國史學界的代表人物時，依然將李鏡池列為「宗教史專家」^③，可見顧對李鏡池宗教史研究造詣的肯定和厚望。但是此時，李鏡池面對空空盪盪的書架，知道自己再無整理許地山遺著的可能了，他對《道藏子目通檢》的下落也越來越悲觀。當年許地山在香港贈予李鏡池的一冊《窺園留草》，至今仍存李鏡池後人處，其扉頁上有李鏡池題記稱：「一九三九年秋寓居香港，為許地山先生編《道藏詳細子目》。書成而許先生以心臟病逝世。許先生以其先人詩草見贈。香港淪陷，藏書留在寓所，都為白蟻所蛀，僅存《辭海》一部。此本雖也被蛀，猶未全壞。所編《道藏詳目》已毀於日寇炮火。」這本《窺園留草》應該也是李鏡池在 1942 年離開時留在香港僅存不多的藏書之一。此後李鏡池在晚年日記、回憶錄中，越來越肯定《道藏子目通檢》已經「毀於日寇炮火」；1971 年 6 月 28 日日記中有為許地山撰寫的輓詩，其中有「道藏遺篇竟化灰」之

①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書信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11-112 頁。

②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 2 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年，第 726 頁。

③ 《顧頡剛氏暢談中國現代史學研究成果》，《民國日報》（瓊崖）1946 年 12 月 22 日，第 2 版。

語。但是，從目前掌握的線索來看，許地山的遺稿不能輕言已毀，它們在香江的戰火中，也可能被盜運棄置某處，或仍被深鎖在某個箱籠中，期待着重見天日的時刻。

結語

許地山之所以研究宗教，與中國近代社會的精神危機是密切相關的。這種精神危機緣於傳統倫理道德體系崩潰後造成的社會性價值失衡。面對這種精神危機，不同的學者基於自身的學術背景進行努力探索，試圖為近代中國社會找到出路。而許地山則試圖藉助宗教來改良中國文化，藉助宗教的形式來重構中國人的價值信仰，這就是他致力研究宗教的根本原因。他是以現代學術視野研究中國傳統宗教和民俗信仰的開創者之一，關注許地山的宗教研究，可以為了解中國學術現代化轉型提供重要的視角。

許地山在歐美印度多年學習和實地考察的經歷，使他能夠深入思考和梳理佛教、道教及基督教的關係和對中國歷代社會的影響，並探求出一條講求實證的科學研究路徑。這條路徑注定是需要艱難的探索與持之以恆的前行，需要學者自己的終身辛勞，身體力行，為後學開闢學術路徑；需要學者以對社會大眾的深切關懷，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時刻挺身而出，成為後學的人格榜樣。李鏡池的學術研究成果，正是追隨研究路徑形成的產物。

回顧許地山與李鏡池的交往和學術合作，頗有戲劇色彩。他們以「同鄉」之誼相識，又以共同的學術興趣、社會觀照、家國情懷惺惺相惜。從 1927 到 1941 年的十四年間，從北平、廣州到香港，師生二人

總能夠不時相聚，互相切磋，互相鼓勵。許地山給予李鏡池學術路徑和思想人格的影響是巨大的，使李鏡池終生引以為楷模。許地山人生中的最後一段歲月定居在局勢相對穩定的香港，這為其落實自己的學術計劃提供了條件。恰逢此時，李鏡池從雲南落魄歸來，也給他帶來一位最佳合作人選，在香港這塊艱難時刻的學術避風港，與他一起完成了一項必須合作的任務。這是兩位學者之幸，中國學術之幸，也是香港之幸。他們在香港留下的學術遺產，仍有許多未解之謎。希望在粵港澳等地學者更多的合作與探尋下，這些謎底能一一揭開。

Guidance of thought and Academic Practice: A Study 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Xu Dishan and Li Jingchi from Beiping to Hong Kong

Yang Zhiwen, Li Mingjian

Abstract: Xu Dishan's literary achievements have long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general public, but his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have been relatively less known. As Xu Dishan's student, Li Jingchi was led by him onto the path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his thoughts and personality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Xu.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y were in Hong Kong together, and Li Jingchi assisted Xu Dishan in compiling the "General Index of Daoist Canon", completing a comprehensive database for Xu's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aoism. Due to Xu's untimely death, his grand academic plan came to an abrupt halt, an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he had already made were lost in

the war. By sorting out and comparing the detailed materials of Xu Dishan and Li Jingchi's academic cooperation in Hong Kong and the recollections of different eyewitnesses, it not onl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t importance of their related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Hong Kong, but also provides ideas and clues for finding the whereabouts of Xu's lost works.

Keywords: Xu Dishan; Li Jingchi; Religious Studies; Educational Reform; General Index of Daoist Canon

(責任編輯：芮駿宇)